

書 評^{*}

周 睿^{**}

Xiaofei Tian 田曉菲

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xv+454 pages.

ISBN 9780674977037

到底是《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抑或是歷代假以「詩史」之名的文學真實中的「三國」故事，能夠代表更貼近事實的三國史志？都不是！沒人在現場，所有的歷史都是後代之人借助文獻或文物（更多是出自想像）重構的後見之明（hindsight）。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田曉菲（Xiaofei Tian）2018 年 4 月推出的中古中國文學研究新著《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就是要與讀者討論文學中的「建安」與「三國」是可以如何被多元結構／解構性地加以闡讀。不同於一般學術書籍的晦澀，這本書可讀性強且趣味盎然，一如田曉菲一以貫之風格，以文本細讀法（close

2019 年 2 月 3 日收稿，2019 年 8 月 21 日修訂完成，2020 年 1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國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英語世界中國古代文學史書寫研究」（編號：19YJC751077）。

** 作者係西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Zhou R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reading) 發現一些見微知著的問題本質。雖然她的細節研究常被大陸學界一些學者詬病為一種「偏執」，諸如陶淵明研究學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龔斌(2010、2012)連續撰文嚴厲批評《塵几錄》「危言聳聽」、「別有用心」、「謬誤百出」，甚至上升到「有極少數人搬弄西方新理論，企圖全面推倒陶淵明這座文化偶像」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層面；復旦大學博士田晉芳(2010)全面否定田著，認定其不過是「文化戲說」、「像這樣的研究方法及其結論，進一步的結果，便是滑向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上海文化》副主編張定浩(2013)也認為宇文夫婦所用「解構主義的招數」，導致結論「常常流於武斷、虛構和臆測」，這些批評都不免狹隘偏激甚至近於謾罵；然而，田曉菲這種研究卻屢在其新見中被證明為令人折服的洞見，她的貢獻在於給我們提供另樣的視角和立場來重新審視一些文學史上已成「定論」的問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

全書分為三部五章，外加導論與結語。第一部分〈疫癘〉(“The Plague”)分兩章〈疾疫與詩歌——反思建安〉(“Plague and Poetry: Rethinking Jian’an”)、〈繞樹三匝——人主、屬臣與文人群〉(“Circling the Tree Thrice: Lord, Vassal, Community”)去重建「建安文學」這個概念的後起歷程，曹丕的《典論》、謝靈運的擬建安詩與蕭統的《文選》，在隔代相互之間形成了內文性(“intratextuality”)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彼此勾連而讓「建安文學」在數百年後的文學史上始得安身立命：以「三曹」和「建安七子」為中心的「文學集團」是如何被後世建構的，他們並非真正自覺的「文人集團」，而更像是某種鬆散的「文人群體」(community)，君臣交往的宴會、書信、禮物都成了這個文人群體彼此身分體認的黏合劑和關鍵詞。在由〈南方視角——「狂熱粉摹寫」〉(“The Southern Perspective: ‘Fan Writing’”)、〈臺與瓦——想像蕪城〉(“Terrace and Tile: Imagining a Lost City”)兩章組成的第二部分〈銅雀〉(“The Bronze Bird”)，作者運用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literary field)理論，以「銅雀臺」為中心，以籍出東吳的陸機之「粉飛客」(fanfic)書寫中非主流的「南方視角」(southern filter)為切入點，探討區別於北方正統的文學史，梳理

從「銅雀臺」到「銅雀妓」，從「銅雀瓦」到「銅雀硯」的流變，把「場域」變成研究焦點。第三部分〈赤壁〉（“The Red Cliff”）單列一章〈還原折戟〉（“Restoring the Broken Halberd”），作者將研究焦點移至「赤壁」這個言語場域，將杜牧的詩、蘇軾的賦經由文本進行細讀，並將之放在整個赤壁文學接受史的宏觀構架中加以觀照，進而討論二者之所以成為左右後世赤壁文學文化，且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因素。作者重點結合了《三國演義》的小說敘事來參讀文學文本相互之間的映射，最後以吳宇森(John Woo Yu-Sen)電影《赤壁》、元雜劇《隔江鬥智》以及當代同人小說中的「三國」映像進行了跨體裁、跨時空、跨文化的分析，以此闡釋三國史在後世的斷章取義與自得其所。

該書之所以饒有趣味，是因為田曉菲提供了豐富細膩又不失啟發性的研究視角，來提請讀者們注意諸多從未引起關注的指向與連繫。與扣人心弦的小說類似，全書的情節框架從疫癘開始，到疫癘結束，從醫療社會文化史的視閥切入災難與傷病之於文學的影響。接下來，田曉菲不斷拋出異彩紛呈又跌宕起伏的論點與論證：中古中國之前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人集團」，「竹林七賢」、「竟陵八友」、山水田園詩派、邊塞詩派等，事實上當時的這些文人並未萌發自覺組織社團的意識，這些集團名稱多是在他們身後被追加的，很多文學史上所謂的「文學集團」係後世出於構建的的心理機制推測出來的——田曉菲認為原因是出自對死者的特有敬意，這樣歸類則容易拔高真實的「文學」（而非文人／文士）實績。被認為原創性闕如、文學性不高的「類書」對於文人知識的意義被反覆強調，田曉菲在近出版的大型學術工具書《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¹中就單撰一章〈類書〉（Encyclopedia）來界定它們對中古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從文學體裁的角度來看，五言詩從民間粗鄙的低級文類逐漸上升為文人精英的高級文類，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田曉菲再次以手抄本時代的署名權（authorship）問題，對「建安」文學史意義的循環論證加以質疑——對於這一問題的討

1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 BCE-900 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論曾在她的《塵几錄》² 中有過充分展開（既為她贏得了學術聲譽也不免攻擊之辭）。曹氏父子對五言詩的興趣與他們人君身分的關係，特別是曹丕以自己的宇宙中心觀來確定帝統的合法性對建安文學的影響，在宴會、書信、禮物往復中的具體呈現上尤其值得斟酌。當時，圍繞曹氏君主身邊的文人群體是超越文人身分的政治假想建構體，在君臣之間以上述實物以及食物饋贈、品味趨同、（公開性）書信覆答、祭祀／人牲／殉主儀式來昭示和鞏固彼此的君臣等級關係（hierarchy），這樣眼光獨到的觀察前所未見。她語出驚人地把三國傳奇的早期流行歸功於陸機對「銅雀臺」的再造之功，如同約翰·伯格（John Berger）《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³ 中以視界的光怪陸離造成對文本的複義闡釋，發現「of/from the terrace」（觀是樓／於是樓觀）的差異表現引人矚目。「銅雀」書寫如何從銅雀臺移至銅雀妓又到銅雀硯的，這個接受史的「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視角因強調豐富生動的歷史文獻細節而變得極有人文關懷性，讓敘事帶有戲劇張力，這也是延續著北美文史學界的經典傳統，例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婦人王氏之死》⁴、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⁵、孔復禮（Philip A. Kuhn）的《叫魂》⁶ 均是這一傳統的典範之作。讓讀者目眩神迷的還有她能夠游刃有餘、信手拈來地綜合運用文藝理論的學術能力：運用心理分析法（psychoanalysis）對杜牧詩中「折戟」意象的重讀，將其解釋成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受挫性力；運用互文理論（intertextuality）把「銅雀春深」與杜詩《春望》和曹操死後的銅雀傳統呼應起來；運用口述史（oral history）和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的思路強調杜牧的私人（private）經歷讓赤壁從文學事件（event）升格成公共的（public）

2 Xiaofei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Penguin, 1972).

4 Joh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5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文學意象 (image)，使赤壁從邊緣的地方性景觀從此進入到中華文學地圖 (atlas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之列；運用新批評法 (new criticism) 對蘇軾的《赤壁賦》以及小說和詩賦中的場景和情節富有差異 (nuance) 的文本細讀尤見其細膩文心——蘇軾完全把自己當成了 (英雄化的) 曹操，把黃州貶謫與赤壁失利等量齊觀起來——這些無疑都是這本書裡不斷湧現的亮點。她突破自我、跨界研究的勇氣，還表現在她對三國人物的後世接受史如何發展與呈現的深度挖掘上。吳宇森電影《赤壁》的「東吳」視角，既是表達對中國文學史上把東吳、蜀漢文學邊緣化甚至隱性化的不滿，更是對政治地緣身分 (如香港文化地位的越發邊緣化) 的思考，最後對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電影、電視劇、電玩、桌遊、同人 / 耽美小說等包含「三國」映像的文本作品的觸及與闡析，更可見田曉菲在研究中不限於文學研究本身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面向。整本書對性別、地緣、族群、心理、政治、霸權、話語等方面的解讀，雖偶不免有過度之嫌，但魅力十足且令人震撼，她把文學文本之間的指涉置換為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從而解釋作品文本受到多重歷史與物質因素的合力影響，在歷時和共時兩個維度不斷生成新意義的可能。

田曉菲把這些與「建安」和「三國」有關的文學、歷史、文化文本放在她所熟悉的海外漢學方法論 (Sinological methodologies) 中，將它們精巧有致又匠心別具地捏合在一起，搭建成一座炫人眼目的「三國」迷樓，遠近風光在你我他眼中折射出不同的「三國志史」。儘管本書難免有學究炫才的論證氣的微瑕，也有限於作者自己當前歷史、視野和語境的褊狹，她質疑和解構文學史上的固有序列和地位、而重加定位之舉略為浮誇，故而易於招致批評——例如她試圖以邊緣但客觀的評判標準來重新定義曹丕在確認帝統過程中的文學史價值，就顛倒原有「三曹」的等級結構而有悖慣例，暗含曹丕的政治地位和馭人之術所產生的實際文學影響，有高於曹植的意味，但這種判斷很難得到創作實績的支撐，既然傳統傳世文獻都逃不過後世文人的政治審查和文化過濾的命運，那麼曹丕的皇帝身分在這一價值建構上所擁有的曖昧光環就理應被剝離。再如田評價陸機所創立的諸多詩學修辭和敘事主旨，形塑了後世建安與三國故事的核心框架，

特別是對「銅雀臺」的再創作與再闡讀，田稱其為推動三國傳奇早期流行的關鍵性人物，這一點與她在《劍橋中國文學史》⁷所撰〈從東晉到初唐〉中，所持早期中古中國「北方」文化形象出自「南方」的文化建構之論調一脈相承，然而，這種刻意彰顯對「南方」視角被排擠之矯正拔高的弔詭之姿，並不能從陸機的文本以及後期三國傳奇中尋求到足夠信服的證據。這一問題還是無法避免：既然對經典的解構是為了重新審視經典成為經典的進程，而她所提出的另一經典的存在，又如何證明自己具有超越封閉傳統的中國文學史的「公正」性呢？這一褊狹或與她所接受北美漢學教育的學術風氣以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倡導的後現代解構主義文學史觀，存在著一定的關聯。在她的前期著作《塵几錄》、《烽火與流星》⁸、《神遊》⁹等，都能看到相似路數與技術。然而，我們大可不必苛責於她，其多元聚焦關注，就是力圖打破局囿於文學、文本、文獻本身單一線性研究模式的嘗試之舉。遺憾的是，目前這本書還沒有推出中譯本，相信不久的將來它會擁有更廣泛的閱讀受眾。

7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1: To 13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 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Xiaofei Tian, *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